

导 论

1.1 理论前提

会话叙事标记研究是通过整合性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研究范式,探寻包括从语用学、语义学、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到会话叙事和话语标记类言语现象在内的研究路径。本节将从语用内容丰富的缺省语义学理论出发,在话语整体意义的启发下探寻常规会话含义与非常规会话含义对于话语标记现象的语用功能指引,充分理解话语的标记现象在会话叙事内涵包裹之下所具有的研究潜质,进而梳理本书的理论前提。

1.1.1 语用内容丰富的缺省语义观

缺省语义学属于注重语境因素且语用内容丰富的语义学模式(Jaszczolt, 2007: 41)。自 Grice (1989: 47-50) 提出会话含义理论以来,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分工便成为关注语言意义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探讨的问题。Grice 利用“修改了的奥卡姆剪刀”(Modified Occam's Razor)来解释意义研究中语用和语义的分界问题,即“字面意义除非必要不作多义解释”,由此他将所言(what is said)列为语义学研究范围,所含(what is implicated)列为语用学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Grice (1989: 47-50)坚信对意义的鉴别要以是否遵循合作原则为参照,当交际者遵守了质、量、关系和方式准则时,其所传达的就是一般含义;当他们违反某一准则时,所传达的就是特殊含义,而语境是检验一般含义或特殊含义的试验田。但 Grice 本人并未阐述具体语境下语用推理的详细过程,这使得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即会话含义成为语义学研究中的必要补充成分和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然而,正是因为他利用了是否具有真值条件这一标准对所言和所含作语义与语用的划分,造成了后续研究中关于所含的规约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的语义-语用边界模糊问题。

针对 Grice 在意义划分中出现的所含义义的划分和归属问题, 后格莱斯语义论者 Carston (1998: 464) 在概念表征系统下区分了关乎真值条件的广义语义学和关乎句法过程研究的狭义语义学。而广义语义学研究表明, 只有介入语用因素的分析才能使语义学研究形成完整体系。Carston 的观点得到了后格莱斯语义论者的部分认同, 如 Bach (1984, 1994, 2007) 以及 Recanati (2003, 2004) 都提到了语义的不确定性, 并指出语用因素对语言表达式的扩充和加强是使语义完整的必要条件。Levinson (1995, 2000) 认为会话含义对语境不具有依赖作用, 但却需要语用推论, 即交际者以默认的推理来形成缺省意义的表达。因此, 会话含义, 特别是一般会话含义, 需要语用和语义的共同协作推理才能完成意义的最终合成。

正是基于上述学者在所含义义的语义-语用界面划分问题上产生的不同观点, Jaszczolt (1999, 2004, 2005, 2010) 提出了“缺省语义学”(Default Semantics) 分析模式。缺省语义学模式将真值条件语用学与 Kamp & Reyle (1993) 的语篇表征理论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中意义的形式化和语义化合并在一起。其中, 真值条件内容包含语用因素, 而语用信息包括有意识的推论形式以及无意识的缺省意义。在此分析框架中, 语用信息独立作用于语法之上, 语用输入被认为与句法信息同样重要。针对语用输入的表征形式, Jaszczolt (2005: 57) 提出了意义表征层次的四个组成结构: 词库、语法、推理和缺省。这四个结构的扩展也就是她进而提出的“合并表征”(merger representation) 概念。合并表征表现的真值条件内容是上述意义表征中四个结构的扩展, 并最终将其输出、合并组成新的独立表现形式, 分别是:

- (1) 词义和句子结构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简称 WS);
- (2) 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过程 (consciously pragmatic inference, 简称 CPI);
- (3) 认知缺省 (产生于人类思维过程的特点) (cognitive default, 简称 CD);
- (4) 社会-文化缺省 (产生于社会文化的组织方式) (social and cultural default, 简称 SCD)。

合并表征的第一步是真值内容处理 (详见 Jaszczolt, 2005: 57; 2010: 200)。图 1-1 的每个箭头均指向合并表征, 示意四个结构对真值内容和话

语意义均构成影响，具体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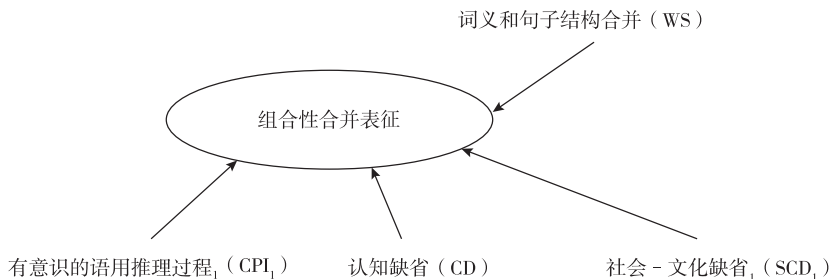


图 1-1 组合性合并表征示意图

第二步是含义处理。

社会-文化缺省₂ (SCD₂) $\longleftrightarrow$ 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过程₂ (CPI₂)

缺省语义学把语义学和语用学合并在一个意义层面，语用信息因而作用于话语的真值条件内容，在这一意义层面上，首要意义 (primary meaning/pm) 即真值内容处理，次要意义 (secondary meaning/sm) 即话语含义处理，共同为话语信息的加工过程提供意义阐释。首要意义主要由组合了各种信息的合并表征 (merger representation) 来体现 (Jaszczolt, 2010: 197-202)。合成性 (compositionality) 是构成合并表征的原则，它体现在词义和句子结构合并 (WS)、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过程 (CPI)、产生于人类思维过程的认知缺省 (CD) 以及产生于世界知识和社会文化常规的社会-文化和世界知识缺省 (SCWD) (Jaszczolt, 2010: 200)。合成性是关于首要意义的信息互动的总和。缺省语义学主张在合并表征下对话语意义进行整体识解，而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和无意识的缺省意义是确保话语意义整体识解顺利进行的关键。这种以合并表征为信息总和的思想促使 Jaszczolt (2016) 形成了对自然会话中互动话语意义如何并合在一起并达成双方可以识解的意义的思考。然而，正如 Jaszczolt (2005: 57-58) 所言，合并表征并非话语表达的唯一内容，会话含义作为依赖有意识的语用推理或社会-文化规约输出的含义形式，也属于话语表达。社会文化规约在话语意义的识解中起重要作用，而话语意义是使用中的意义。为了区分它们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才有了在第一步合并表征和第二步含义处理中各自出现的社会-文化缺省和有意识的语用推理部分。简而言之，缺省语义学模式既包含语用因素，又包括语义成分；既包含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又包括来自社会-文化缺省 (SCD₁) 和认知缺省 (CD) 的语义扩充意义 (Jaszczolt,

2005: 207); 缺省语义最终来源于说话人意义和缺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文献将“Default Semantics”称为“缺省语义学”的(毛继光、陈晓烨,2010;束定芳,2008;唐韧,2012),也有将其称为“默认语义学”的(张权、李娟,2006;张绍杰、张延飞,2012;张延飞,2016;张延飞、梁妮娜,2023)。将 default 称作缺省也好,默认也好,都不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对 Jaszczolt 互动的缺省语义模式进行分析和应用。本书使用“缺省”这一提法,原因在于,“缺省”包含了话语表达中缺失省略的含义,在语义解码和意义阐释中主要指代言语交际过程交际者所言中缺失和省略的步骤内容意义,此时语言作为主体直接体现了缺省的步骤含义;而步骤意义在人的主观概念中最终形成的就是人们所默认的意义,此时人是理解默认意义的主体。因此,我们必须清楚本书所谈论的对象,是在语言层面起连接作用的标记现象,此时语言形式作为主体必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缺省的步骤意义,而语言表达和理解中所缺失和省略的形式内容指向也使得我们更倾向于以“缺省”的提法对其加以描述和运用。

1.1.2 语用缓和观

语言学领域针对缓和(mitigation)的研究在于探寻交际过程中能够减少言语带来的人际冲突并有效维护交际者面子的话语策略或手段(Brown & Levinson, 1987; Fraser, 1980)。自 Fraser (1996) 将缓和引入现代语用学研究之后,作为语用现象的缓和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冉永平, 2012b)。

就语用缓和的表现形式来讲,语用缓和涉及交际者对具有缓和人际功能的语言形式及话语策略的选择和使用(Thaler, 2012: 911)。语用缓和的话语策略是缓和机制得以运行的基础,Caffi (2007: 49) 进而指出命题(包含所指指向和述谓表达)、施为性话语(如含有言外之意的动词、加强言外之意的表达等话语行为)以及话语的指示来源(如言者在话语发生时刻的所指指向)是缓和性话语策略得以形成的关键参数,它可以是一个词语、称呼语、一个或几个话语等(冉永平, 2012b: 5),从而降低言语行为对于听者所产生的不悦效果的可能性(Fraser, 1980: 341)。以此而言,缓和话语运行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涉及了言者在语用指向上的话语选择与运用,这契合了本书探究叙事标记的语用衔接与细化的指向性问题。

就功能而言,语用缓和可以有效地实施言语行为,传达语用含义

(Fraser, 1980: 341)。以不同表现形式呈现的缓和话语在语用功能上或具有服务于自我话语功效的(self-serving)语用功能,此时消除了话语于言者而产生的非积极影响;或具有关切于利他话语功效的(altruistic)语用功能,此时减弱了话语于听者所产生的消极影响(Fraser, 1980; Caffi, 2007)。因此,语用缓和的主要功能是缓和言者与听者的交际话语,进而产生积极的话语影响,从而维护人际话语关系,避免冲突话语的形成,达成语言以言行事的功能。

就研究方向而言,语用缓和包括对具有人际缓和功能的语言形式或策略的探究,也包含针对实现人际缓和用意的语言交际过程的研究(冉永平, 2012b: 4)。语用缓和观旨在通过调试言语行为以减少面子威胁,避免交际冲突,实现顺畅的人际交际,因此也被置于礼貌(politeness)研究领域(Caffi, 2007: 87),探及了社会性关联用语、认知关联行为话语和修辞关联话语(van Dijk, 1984)、文体关联缓和语(Gumperz, 1982)、情绪关联缓和语(Caffi & Janney, 1994)等研究转向,从而在实际语例中具体探讨缓和用意的达成过程。

语用缓和观涉及了非常规会话含义的产生,是具有交际者元语用意识的一种话语策略体现(Caffi, 1999, 2007)。本书在探讨叙事标记语用指向问题时,使用语用缓和观指导叙事标记在机构性会话叙事语境中作为表征自身话语驱使性与确信度的一种语言形式,也是语用缓和观用以指导机构动态交际与人际维持的一次有益尝试。

1.1.3 会话叙事

会话叙事是源于日常交际的一种语体。不同于文体,语体是说话的一种体式,是话语交际的“体”(方式或结构系统),它应当指“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时产生和遵循的原则与规律(冯胜利, 2010: 400)。和时事访谈或政务交流等正式语体相比,日常交际中交际者自发形成的故事讲述活动属于一种非正式语体。

简单来讲,会话叙事指的是日常会话交际中的故事讲述活动。会话叙事的定义和研究框架大多来自学者们针对叙事(Labov, 1972a; Labov & Waletzky, 1967; Ochs & Capps, 2001; Polanyi, 1985; Quasthoff & Nikolaus, 1982; Toolan, 1988)以及对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Cohan & Shires, 1988; Fox, 1993; Georgakopoulou, 2007; Jefferson, 1978; Norrick, 2000; Page, 2015, 2017; Sacks, 1974, 1992)。会话叙事最初是

作为自发性会话的次级活动类型出现的(赵玉荣, 2013), 它的分析路径大致结合了 Labov (1972a) 对口语经历叙事的分析以及 Sacks (1974) 和 Schegloff (1992) 对叙事话语序列的分析。Quasthoff & Nikolaus (1982) 将会话叙事定义为由话语情境和功能变量所构成的用于形成交际者对过往经验及其对话语当下产生影响的自发性话语单位, 会话叙事因此具有交际评价功能; Toolan (1988) 则认为会话叙事的最简形式是非随机相连的一系列可被叙述和感知的事件; 而 Cohan & Shires (1988) 把叙事最为显著的特征归结为叙事本身对事件的一种线性叙述排列和组织; Fox (1993) 则从主观的经验层面入手, 将叙事定义为根据时间维度来组织个人经验的一种基本方式。

较早从日常自发性会话交际出发研究故事讲述活动的学者是 Fludernik (1996: 13-19), 她采用“自然叙事”这一说法, 指出在正常的日常交谈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自然叙事非常值得研究, 这种“自然的会话叙事”常用来区别未经考虑而产生的, 以及具有“构建性”的人物在具体故事语境中的叙述。Fludernik 特别强调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性故事讲述活动, 并指出经验性会话叙事是自然叙事和其他一切叙事的叙事原型。此后, Norrick (2000: 27) 将“会话叙事”作为术语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他将会话叙事定义为“不同于文学叙事文本的自然叙事, 是一种出现在日常自然会话中的叙事, 具有面对面互动交际, 话题动态发展, 话轮转接没有固定次序和长度限制的叙事特点”。会话中的叙事和故事因此属于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Page, 2015)。这个定义在概念上基本等同于 Fludernik 所提到的个人的经验性会话叙事。

Ochs & Capps (2001: 19) 在其著作《生活叙事》(*Living Narrative*) 中修正了 Labov 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模式, 并指出日常会话中的叙事特点, 即结构欠完善、连贯性不够和叙事维度的多样性。他们提出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 交际者对彼此间未预先设计、不经任何修饰的生活事件的叙述活动才是会话叙事的研究主体。而生活中的会话叙事的话语意义是随着交际双方的社会立场、道德、经验、态度等实际语境的互动合作而变化的。与 Ochs & Capps 的观点类似, Herman (2002: 149) 也提到了故事讲述和故事内容的消化处理方面的事实不能被预先限制在偶然和不可预见的范围之内, 而应置于会话叙事交际参与者的实际活动之中¹, 我们应该思考会话叙事中互动的叙事话语是如何展开的。Bamberg (2004) 及 Georga-

1 也可参考 Herman (赫尔曼) 汉译本《新叙事学》(马海良译)(2002)。

kopoulou (2007) 提出体现语境特征和互动特征的生活叙事的“小故事”概念, 指出会话叙事分析不应再聚焦于具备典型性和完整性特征的访谈故事讲述, 而应分析谈话中碎片式话轮组合而成的非典型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以个人对过往经历为主的叙事原型故事讲述, 而是叙事原型大框架下的一种非典型性叙事行为, 包括对正在发生事件的讲述, 未来或猜想事件的讲述, 共同知晓事件的讲述以及讲述中的暗示、延迟和取舍等叙事行为。

参照上述会话叙事的定义, 并结合本书的研究目的, 我们赞同并将适当修正 Bamberg (2004) 及 Georgakopoulou (2007) 的“小故事”观点。他们提到的“小故事”概念和汉语情境下日常会话中出现的故事讲述特征有重合之处, 却也不尽相同。

相似之处是人们在谈话中的确常常使用碎片式话轮组合来进行故事讲述, 故事话轮交叉会话话轮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会话。“小故事”通常结构不够完整, 叙事性话语特征也不够明显, 但就过往经历所涉及的故事讲述而言, 它在汉语情境中的语例并不少见。会话中的交际参与者往往因为即时语境下的某件事情, 某种物品或某个场景而讲述一个或几个故事。此时的参与者根据记忆经验调取具有相关性的过往经历进行讲述, 故事讲述者的记忆经验层面, 是以记忆碎片的形式散落在长时记忆系统中的 (Riessman, 1993: 9; 施铁如, 2010: 247), 在被会话情景中不同因素激发后, 回忆、反思并收集起记忆中的零散信息, 从而构成会话中正在讲述的故事。和会话叙事在后经典叙事学关注的重点一样, 对会话中散落的“小故事”的话语意义研究也要“考虑具体语境和说话人的意图”(刘风光、薛兵, 2014: 766)。而连接会话和叙事之间的纽带, 即交际者所使用的会话叙事标记, 是言者和听者在回忆、反思、收集并讲述故事事件中的连接语和过渡语。

1.1.4 话语的标记现象

过去近四十年, 关于话语标记的研究历程, 从术语之争到研究实质之争, 从词例的个案探讨到语例内部渐成系统, 无不得益于国内外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以不同目的进行的方式多样和标记各异类型的探索。顾名思义, 话语标记由修饰词“话语”和中心词“标记”构成。“话语”意指其意义表征指向话语语篇层面, 这其中既包括口头语篇, 又包括书面语篇; “标记”意指其在话语语篇中标记或标识了交际者所描述和产

生的意义。语义学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意义的表达系统,而语用学研究则重点关注语言使用中的意义体现。因此,要了解话语层面联系标记的标识功能,就有必要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双向层面对这种语言现象的意义和功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分析,国内外学者对话语的标记现象研究大致分为四个走向,即研究句法功能和语法分类的语法化标记走向、研究语用信息推理与表达的语用化标记走向、研究语义值和连贯关系的语义化标记走向和研究心理认知与交互的认知化标记走向。总的来讲,话语标记的语法化和语用化研究数量多于语义化与认知化的研究。这和 Halliday & Hasan (1976)、van Dijk (1979) 以及 Fraser (1987, 2006) 在研究早期阶段针对句法现象以及语用功能对话语标记进行划界有直接关系。除此之外,Blakemore (1992)、Schiffrin (1987) 以及 Redeker (1991) 等学者也纷纷从语义连贯阈值和交际主体认知层面对标记现象的语际关联与推理特征作出新的界定。这些研究都为后续各国学者对话语的标记现象探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从以上四个研究走向所使用的语料数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话语标记现象的共同关注点已从书面语篇拓展至自然口头语篇。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兴起的对会话分析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自然会话语篇的真实性、自然性和不可复制性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语料视角。

文献检索显示 Labov & Fanshel (1977) 在使用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时最早提及了“discourse marker”(DM)这一术语,但他们并未对这一说法进行功能及意义方面的介绍和扩展。但更早一年,Halliday & Hasan (1976) 在讨论英语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机制时就已提出语句联系词(sentence connective)这种说法,其功能逐渐被冠以与话语标记具有同等意义的语言形式。此后使用 DM 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 Schiffrin (1987)。她提出了话语标记的话语连贯和语境坐标观(discourse coherence and contextual coordinate)。而 Fraser (1988)、Östman (1995) 以及 Knott & Dale (1994) 将标记的基调词由“话语”变为“语用”,他们在研究中使用“语用标记”“语用小品词”以及“语用联系语”等,认为这些标记在编码中均涉及交际者的思维状态或交际意图,其本质是扩大了包含话语标记在内的具有评价表征意义和言语行为意义的语用型话语标记。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者对 DM 的梳理探究主要源于它的质同名异的称谓形式的变化。基于 Fraser (1999) 对话语标记的总

结，并结合 Ebsco 检索数据库和最新文献统计，我们将英语文献中最常见的十种针对话语标记现象的提法列举出来（参见表 1-1）¹，发现“discourse marker(s)”依然是研究者们最常使用的、接受度最大的提法。不同于以往文献中提到的关于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是话语标记的最直接和最常见替代术语，此次检索显示，语义制约语（semantic constraint）的研究频次高于语用标记，这和 Quirk et al.（1985）提出的句子中的类状语可视为连接上下语言单位的逻辑语义连接语以及 Blakemore（1987）之后发表的著作《关联性的语义制约》（*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有很大联系。

表 1-1 英语文献中“话语标记”最常见的十种称谓形式

称谓形式及排序	检索显示数量	称谓提出者
1. discourse markers	1454	Labov & Fanshel, 1977
2. semantic constraints	1268	Blakemore, 1987
3. pragmatic markers	789	Fraser, 1988
4. discourse particles	716	Quirk et al., 1972
5. discourse connectives	664	Redeker, 1990
6. pragmatic particles	649	Östman, 1995
7. discourse cues	209	Schourup, 1985
8. discourse operators	40	Polanyi & Scha, 1983
9. pragmatic connectives	25	Knott & Dale, 1994
10. semantic conjuncts	17	Quirk et al., 1972

从直观数据可以看出，国外学界针对话语标记的提法和研究走向大体上是在话语标记本身的话语功能成分意义（如以 discourse 称谓开头的提法）或是其在语义或语用（如以 semantic 或 pragmatic 称谓开头的提法）的功能分支层面进行探讨的。

同样，汉语中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也存在着因研究侧重点和出发点不同

1 表 1-1 所列举的文献统计均来自 Ebsco 检索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其中对关键词，即布尔逻辑 / 词组的检索均为“复数”并含“单数”形式。例如，对 discourse marker 的检索形式是：discourse markers 并含 discourse marker，表中剩余的关键词检索均依据此形式进行。检索方式是依据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出现相关匹配条目的模糊检索形式，检索选择文献语言为英语。

而形成的术语多样化特点(参见表 1-2)¹,我们根据 CNKI 数据库检索得到的不完全统计,“话语标记”在汉语中的称谓形式部分译自英语,其称谓方式随着学者们研究目的或话语标记的个体案例而呈现出多样性。何自然和冉永平(1999)对英语连词如 anyway、after all、however 作为话语联系语进行了语用制约的探讨;方梅(2000)使用话语标记的提法对汉语自然口语中弱化的连词探讨表明了其在话语组织、言语行为功能上的不同;马博森(2001)围绕话语标记 y’know 等程序意义和其在英语叙事语篇中的交际意图展开了话语标记的关联探讨。而李勇忠(2003a)和冯光武(2004)则采取了语用标记(语)的称呼方式,前者是对话语标记在语用关联和连贯中所具有的语篇、人际和元语言功能的总结,从其研究来看是对话语标记的重新梳理而扩展的语用层面的描述,后者在研究中区分了语用标记的语义意义、概念意义和非概念意义,如“但是”和“我警告你”,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显示的是言者对话语单元之间语义关系的一种判断。

表 1-2 汉语文献中“话语标记”最常见的称谓形式

称谓形式及排序	检索显示数量	汉语称谓出处
1. 话语标记语	512	冉永平, 2000
2. 话语标记	467	方梅, 2000
3. 语用标记	49	李勇忠, 2003a
4. 语用标记语	36	冯光武, 2004
5. 话语联系语	23	何自然、冉永平, 1999
6. 元话语标记	23	李秀明, 2007
7. 元语用(标记)	20	吴亚欣、于国栋, 2003
8. 话语 / 语篇连接词	10	董敏, 2002
9. 口语 / 话语 / 语用小品词	7	何安平、徐曼菲, 2003

目前来看,国外最常见和采纳率最高的理论框架来自以下三位学者所开拓的话语标记视角:

(1) Schiffrin(1987)的“语境坐标连贯”观。此种观点主要强调话语标记对局部连贯的衔接作用,并指出类似衔接是通过话语中相邻话语单位间的关系才得以建立的;

1 表 1-2 的文献统计来自 CNKI 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检索方式是依据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出现相关匹配条目的模糊检索形式,检索选择文献语言为汉语。由于汉语中对 discourse marker 的称谓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此仅列举了检索数量大于或等于 2 篇的称谓形式。